

许威汉 著

许威汉语研究文存

中华书局

许威汉语文研究文存

许威汉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威汉语文研究文存/许威汉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08.8

ISBN 978 - 7 - 101 - 06038 - 6

I. 许… II. 许… III. 汉语 - 研究 - 文集 IV. H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1906 号

-
- | | |
|------|---|
| 书 名 | 许威汉语文研究文存 |
| 著 者 | 许威汉 |
| 责任编辑 | 陈 乔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 http://www.zhbc.com.cn |
| |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 |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
| | 印张 16 $\frac{3}{4}$ 插页 2 字数 600 千字 |
| 印 数 | 1 - 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038 - 6 |
| 定 价 | 48.00 元 |
-

自序

在拙著《语林探胜》(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出版之后,感触良多。该书的编审写了“内容提要”提醒读者注意,“本书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系统地反映和研析了古代及现代的语文诸现象,涉及文学及有关边缘学科,巧妙地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表达了本属深奥难懂的学术研究成果,使‘阳春白雪’变成了‘曲高和众’的雅乐,有利于增进知识、提高阅读、欣赏与表达能力,对广大语文爱好者及语文工作者颇具参考价值”。

上述嘉誉,愧不敢当,唯愿以为永生之鼓励与鞭策,俾老马奋蹄再尽余力。今另积有拙文近百,经筛选,愿继就教于同道学人。许多篇为近年新作,不避谄陋,酌选若干有重要见解者,长论短议(长论三万余字,短的一二千字),兼收并蓄,集结成册。记得一位同乡前辈著名数学家在给我颁发“上海市高校文科著作、论文特等奖”时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教学比一般科研难。教师先要懂透教学内容而后教懂学生,学生懂了要会得用,用要见成效,经过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而得到真理性的证明。”我深表赞同,更在教学上狠下工夫,同时更力求教学结合科研,科研促进教学,相辅相成,因而许多拙作多寓教研陋见。

桑榆虽晚,而问学之心未已。拙论《复音词的产生主要是应词汇内部调节需要》发表后,河南大学沈怀兴教授《汉语词汇复音化新探》一文在论述“七十年来汉语词汇复音化的成因的研究”中,剖析包括高本汉、王力、张世禄以来的众多学者的申论,指出“真正能够集过去七十余年研究之大成的文章,只有许威汉一篇(1988 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通讯》2000 年第 12 期 11 页)。拙文《古汉语语法三议》(《古汉语

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 1998 年）在“语法研究三个平面”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四个平面”。此议深得国内外学者的赞赏。再有，历来所有学者、所有语文工具书，一概认为汉语有三个特性，笔者认为还有第四个特性，首次在拙著《汉语学》的“绪论”中提出，并在《宏观语言学》（英国）中阐述。文章题目是《略论汉字与汉语的适应性》，虽未标特性之名，却寓特性之实。章太炎的老师俞樾之上上力作《古书疑义举例》百年来不曾有人作全书的论析，笔者则作全面剖析；杨树达力作《词诠》收虚词最多，草创之功不可没，现实意义、学科价值未可忽视，而出版后的八十年来也不曾有人作全面系统的论析，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重印《词诠》之际，笔者应约写了万字的叙论，首肯其功绩，也指出其所失。论析俞、杨二名著虽共达四万余言，但皆务实，力避泛议，言不妄发，有的放矢。

同时，笔者想再敬告读者一些陋意：一是《论汉语词汇体系》一文，自度不失独属管见，虽曾被收入另集（《20 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 2004 年），今仿大家（如王力）做法，本书不辞再加列示，或可增多向读者请教机会；《新拟诗韵、词韵合检（兼上溯《切韵》，下及曲韵）》之作，未见前贤时秀有此尝试，虽亦收入另集，今仍复用为“附录”，或可有利检索（收以简驭繁之效）。二是取例、说理有复出现象（如引陆宗达文例，关于词义扩大、缩小、转移之评，语言学科发展史实及其间各分支相互交错渗透之说理等），这是因为一方面笔者对同一现象的认识不断有所加深，而后便复述补叙；另一方面是笔者在不同场合要求作典型有效之选用而不避复。三是为便本书阅读，若干行文常取法前人传籍，夹注夹议，兼明出处；综参相关资料的间接转达中，常益己见，凡未便逐一分列出处者，亦示意读者依语境而知之，其有可取，当归功原论著作者。四是力求“井水不犯河水”，确有必要时，不避直抒陋见，偶失谦恭，敬祈见谅。此外缅怀恩师一文，兼有感于老校友唐兰、王遽常、蒋天枢、钱伟长所议恩师“文理兼顾，教学有方”等而发；述笔者个人身世片段，中附诗作寓意，仅为利于表达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之感怀，诗

作固不足道也。

承中华书局领导和语言文字编辑室的几位先生多方锦注指导并全面面对读者与笔者负责,使本书得以出版,雅意殊殷,不胜篆感!但愿老马仍能奋蹄不息,无负深情厚望。

本书有关资料的核查,幸得孙女许芳协助,防止若干疏失,顺此说明,并聊引自慰。

笔者限于识见与功力,论述不当、乃至失误,自是难免,请读者有以教之,拙作唯抛砖引玉而已。

许威汉

2007年5月于上海师大寓所

时年八十有余

目 录

自 序	1
-----------	---

论 文

谈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借鉴与发展(纲要)	
——兼述东西方文化培育中国语言学	1
综论文史、语言研究的考辨	21
论晚清一部重要的训诂学著作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研析	29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一失之我见	51
谈训诂学研究	54
谈研习训诂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68
谈汉字的发展演变	73
论汉字发展的趋势	82
漫谈汉字体态及其演变因素	91
略论汉字与汉语的适应性	95
简论《说文》研究对词汇研究的启示	101
汉语词汇学引述	111
论汉语词汇体系	129
复音词的产生主要是应词汇内部调节需要	139
语词研习的认知与实践	144

论词义学习	152
王力对词音义关系的理性综合的概示	
——兼述何九盈、蒋绍愚对王力概示的施用	172
佛经音义研究的新收获	
——首届佛经音义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	183
论《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	190
《汉语白话发展史》叙论	207
论杨树达力作《词诠》	211
汉语语法学历史画卷的成功展示	
——论《中国古代语法学探究》	223
古汉语语法习研导论	231
古汉语语法研究三议	250
议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取向	263
简论汉语学和语文学	272
古汉语教材建设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282
张世禄在文字学上的贡献	289
王力在词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	300
语文学科的方法论	308
从语言的模糊性展望模糊语言学	318
聋哑人的思维问题	329
《南北朝的诗和散文》自评和补议	334
浅谈格律诗的认识与创作	339
从古代作品中看用词的正确、简练与生动	353
《孙子》研习丛议	361
丛论古籍·章句·训诂·句读·注释	
——兼论古书的阅读与研究	375
试论 20 世纪传统训诂学的新发展	409

序言·书评

《戴震全书》序言	431
《孙子世系考述》序言	434
《〈慧琳音义〉研究》序言	437
《玄应〈众经音义〉研究》序言	439
《汉语词义学》序言	442
《汉字古今义合解字典》序言	445
《古汉语精解词典》序言	448
《中国文化源》序言	452
《简明文言语法》序言	455
“语言书林”序言	457
评《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 ——词义学与词典学研究的新成果	460
《扬雄〈方言〉集释》读后	464

札记·随想·答疑·小考

“理”的承继与发挥的论述评要 ——陈白沙研讨会发言辑录	467
故作高深,非学林正轨	469
端正文风,达到文质相资	471
从纳西东巴文假借字研究所想到的	474
文言文中的省略	476
答语文教师的提问 ——针对所提有关语言文字的学用问题	482
苏州悬奖征联与澳门悬奖征联之缺憾	485
“俊”与“隼”同异说	488

《兮字的读音》一文指误	490
-------------------	-----

附 录

缅怀、追记恩师

——一代文化巨人唐文治老校长	492
学习教研历程断片	502
新拟诗韵、词韵合检(兼上溯《切韵》，下及曲韵)	514
笔者著作、主编、主审目录	522

后 记	524
-----------	-----

谈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借鉴与发展(纲要)

——兼述东西方文化培育中国语言学

引 言

谈到文化,情况相当复杂。“文化”定义,说法歧出。涉及文化的问题,有文化形态、中国文化传统估计、中外文化交流、文化中心等;对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和核心精神,有诸子说、“礼”说、多元说、变化说、思维方式说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有肯定的、有否定的、有折中的;对待中西文化,有主张“西体中用”的,有主张致力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有主张去粗取精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不一而足。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本文讨论的中心是中国语言学,自然得有文化视线,上述关于文化的诸问题,非本文专门探讨之列,但在涉及某些文化现象时,则依个人有关理解申述。

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的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按:也影响到词汇研究);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7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面临这一实际,对中国语言学进行历史回顾,窥视其文化轨迹,不无重要意义。

中国语言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源远流长。说它古老,是它发端于先秦,独树一帜;说它年轻,是它随着科技文化发展、社会需求以及语言自身要求解决一系列内在问题正向精密综合方向发展。

一 语言研究的萌芽

(一) 汉字的创造

汉字“与汉语单音成义的特点相适应”(王力《汉语浅谈》)。汉语的一个特点是语素的单音节性,作为语素的音节都有严格确定的音韵模式,即各种音位在音节里有严格固定的位置,声调贯穿整个音节(声母+介音+元音+韵尾+声调)。基于汉语这一分析型的孤立语特点,汉人的祖先就在语素的基础上创造了汉字(这样的汉字,可称语素文字),既与汉语特点相适应,也有利于消除方言的干扰。语素汉字的创造,表明汉人祖先“对自己所说的语言进行过萌芽状态的、然而却是奠定基础的语言科学的分析”(邢公畹《中国的语言研究》,载《语文现代化》1990年第9期)。语素汉字创造之后,古人把语言和文字混同在一起研究,甚至把文字当作语言本身来研究,“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王力《中国语言学史》211页)。正因为这样,回顾汉语研究,就先要着眼汉字的创造及其对汉语研究的作用。

汉语产生在先,汉字创造在后。汉字的创造,基于对汉语的研究,从殷商的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三千多年历史,那么对汉语的研究也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如果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中去推究,从新石器时代遗物中去考察,从殷商时代文字史料的积累中去探讨,可以断定汉字在夏代就初具规模了。如果连同汉字的原始阶段也算在内,那么汉字创造的年代更早。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推论“汉字有一万年的历史”,从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出土的黑陶尊外部表示早晨太阳初升景象的合体字来看,汉字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创造出来了。的○像太阳,△像云气承托着初升的太阳,像山有五峰形(古文字中的山多作三峰形,商器父壬尊的山作五峰形),与后来简化了的“旦”字相同(“一”表示天跟地交界的地平线,“日”从地平线上升起)——依

于省吾说。它已经不像所谓“记事图画”那样以整个图形和语言的片段相结合,而是和一定的词相结合了;也不像“记事图画”那样随意,而是有一般文字的固定性了。汉字最早是独体的,后来才有了合体字,合体字的出现,表明了祖先思维能力的发展、语言研究的发端、文化意识的展现(文化与语言、思维关系极其密切)。

汉字的不断创造,意味着汉语研究的不断进行,展示着汉文化的不断发展;而汉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汉语的发展与研究,促进了汉字的更好创造及其记录汉语效能的发挥。20世纪60年代我国科学工作者从实际观察中,发现猫头鹰吃老鼠一类小动物是整吞的,吃完后消化不尽的骨殖及皮毛搅成一团吐出如丸,这被有些专家看成揭示了生物界的一个秘密,并拍成了科教片《不平静的夜》。可是我国古代的“𩇛(wéi)”字早就记录了当时的语言并反映了这一事实。许慎《说文解字》:“𩇛,鸢鸟食已,吐其皮毛如丸,从丸,𠂔声,读若骖”(转引自陆宗达《说文解字的价值和功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3年3期)。这是汉族发达的文化在汉字创造方面的反映,也表明汉字的创造基于汉语的研究。唐德刚(美籍华裔学者,纽约市立大学教授)说,汉字“保留了19世纪以前人类最丰富的记录,总容量超过人类文明史其他文字所保留的总和”(转引自《编译参考》张文中摘),汉字的巨大贡献,也正体现了汉语研究的高效能。汉字输入日本、朝鲜、越南,走向世界,促进东西文化交流,这是汉字创造的功绩,也是汉语研究的功绩。因此说,汉字的创造,是汉语研究的发端。这是汉族文化史、汉字学史和汉语史都早已证明了的。

(二)语言论的出现

先秦称述的“名”指概念,从语言角度说,接近于今天说的“语素”。中国古代的语言理论伴随着名学研究同时出现,语言理论寓于名学之中。名家代表作除了《公孙龙子》以外,其他著作已早佚,现存《邓析子》、《尹文子》系后人伪托(既是伪托,就没有必要去谈它了)。后期墨

家《墨经》、《经说》，儒家荀子的《正名》，都是名学的专论。他们在阐述认识论等哲学思想时，对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不妨说，先秦时代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的摇篮中哺育的。可惜时至今日，人们尚少发现和关注。

“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提出了有关语言学重要的原理和基本问题：

1. 谓语和主语的关系。“举(举名)，拟实(实名)也。”(谓语是模拟表述主语的，必与主语相应)

2. 语言的作用以及“名”、“言”的组织关系。“言，出举……言由名致。”(从逻辑学角度讲，“言”是“命题”；从语言学角度讲，“言”有几个义项，这里指句子，总的含义是：表明一个句子用语音来表达事物，是集合名形成的)

3. 在墨子心目中，已经觉得“且”这个虚词和“名”一样重要，分析了虚词“且”字的语法作用，并指出虚词“且”和“名”有同等的价值。“自前曰且……方然亦且，若名者。”这是分析虚词的最早资料(例证)。

4. 语音和意义的关系，即现代说的声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清代乾嘉学者指出“训诂声音，相为表里”，人们以为是首创，其实早在两千年前的墨家已经指出过，只是人们所不知晓罢了：“声出口，俱有名。”

5.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思想交流离不开语言。“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

此外，墨子对区分名词的类别和分析谓语的类别方面也都有论述。总的说来，墨子提出上述理论，主旨是“正名成事”，即说明名和实的关系、名和言的关系，“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而其间寓语言学精义。进一步发展，继而出现了荀况的《正名》篇，更为精湛独到。《正名》阐述了“性”(天赋的本质，生理的)、“情”(心理上产生好恶之情)、“虑”(思想上辨别其是非可否)、“伪”(就修养的功夫和效果而言)、“智”(指对事物的认识)、“能”(才能)的进程。指出“制名”是为了“指实”，“名定”才能“实辨”，

“名闻”才能“实喻”，从而说明词和概念的密切关系，以及词的确指性与稳定性。《正名》还指出概念和词的概括性、差异性是由客观事物的同异所决定的，所以有“单名”、“复名”、“共名”之分：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译文：接着就要给这些分出来的类命名：相同的事物用同一个词来表示，不同的事物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用一个语素构成能让大家听懂，就用一个语素；用一个语素构成而大家听不懂，就用两个以上的语素。一个语素构成的单名和用两个语素构成的复名之间没有冲突或相违背的，即虽然有具体差别而性质却相同的，就用共名。这时候用了共名也不会有妨害的）。

笔者按：“虽共，不为害矣”，可以这样举例来理解：“马”是单名，“白马”是复名，而“白马”也是“马”，不是“非马”，就用共名“马”来表示也不会有什么妨害的。又按，“矣”和“也”都是表示陈述语气的词，“也”重在表示解释、说明和判断的语气，“不为害矣”说成“不为害也”较妥。今不便改动原文，但可依“不为害也”理解（“也”用作虚词的历史也较短）。

“共名”又有“大共名”和“大别名”的区别：

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而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而后止。

共名之上还可以有一层层的共名，每一层共名之下就是别名；别名之下还可以有一层层的别名，每一层别名之上就是共名。“别”的最下一层就是“无别”。

《正名》提出“共”与“别”的相对性，反映出在“名”的分类问题上极具进步意义。《正名》还指出：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命，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译文：“命”，呼；“实”，

概念；“命实”，谓命之於实，即加在某种概念之上；“实名”，谓有实之名，即有固定内容的名称）。

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用什么词表示什么概念，开始时不是必然的、固定的，但词和概念的联系一经约定俗成之后，就不能随意改变了。而这种社会性为“约名以相期”（约定事物名称来进行交际），不但正确地解决了“名”和“实”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指出了语词产生的社会因素。这个问题是语言研究上的最基本的问题，古希腊人也长期讨论过，《正名》则最早作出了卓越的回答。

以上所述仅为墨子、荀子语言论，未涉及他人，且又都属举例，未概全貌。拿荀子《正名》来说，还谈到考察事物的实质来确定事物名称的数量（“稽定实数”），指出名的数和实的数之间的关系，这既是“制名”的基本原则（“制名之枢要”），也是认识词的概括性和差异性的基本原则；又谈到使用语言应遵循一定的规范或标准（“守名约，从诸夏”），这表明必须正确处理标准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就未一一例析。

先秦诸子学说蜂起，代表了当时学术的繁荣，反映了文化史上的民主传统，使我国古代学术文化大放异彩。诸子从历史上继承了不同的文化遗产，学术研究伸向各个不同的侧面，语言论仅是从哲学涵义上涉及的一个侧面而已。仅在语言论上，诸子有过如此精湛的理论，自是难能可贵，可惜后继乏人。况且，已经提出的高水平的论述，后世也还缺乏缜密的论证，非但未得充分发扬，且几淹没不闻。我们应更好发掘先秦语言论，并参酌同期中外其他有关论述，益以新知，恢复古文化的活力。

（三）文献训释的开始

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以考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所以早期人们把语言学当作人文学。我国继语素文字的创造之后，在先秦诸子语言论出现的同期，也开始了对古文献的训释。孟子所见的《书经》有“洺水警

余”这句话,孟子解释说“洚水”便是“洪水”,就是文献训释的实例。文献训释是文化延续的必然步骤。

早期文献训释常伴随着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而出现。

首先,语文(先秦文、史、哲不加区别)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学或政治主张。比如《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又比如《孟子·滕文公》叙述夏、殷、周三代的田赋名称不同:夏叫做“贡”,殷叫做“助”,周叫做“彻”。孟子解释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孟子以“彻”解释“彻”,是用一个常用的字义解释一个不很常用的字义。“彻”的常用意义是“通”,孟子大意是说“彻”系天下通法,不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助”是“凭借”的意思,公家凭借人民的力量耕种公有土地。孔孟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是通过字义的训释来实现的。

其次,语文作者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哲理或政治主张。比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叙述邲之战中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以显示夸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同意这样做,在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的字形是从“止”从“戈”,说只有停止干戈才够得上称“武”(“武”的造字原意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这里不是专作字源的探索,其他的分析说明暂略)。

再其次,是辨析同义词(包括近义词)以明哲理。比如《老子》:“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夷、希、微”是哲学上的术语,一般人不大了解,《老子》加以辨析,以明其哲学含义。

以上各种训释,尽管都另有目的,但作用有相通之处,即都通过语言文字的训释来反映,所以也应该算是先秦语言研究的一翼。

综观上古时期的语言研究,可以断言,表意制汉字的创造、先秦语言论的出现和文献训释的开始,是我国语言研究处于萌芽阶段的标志,它给后世语言研究以启迪,并为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中外文化的比较提供了一面历史镜子。